

TRANS. BY WANG RUSHENG & ZHANG YANG WORLD MASTER THINKERS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里

〔英〕昆廷·斯金那 著

王锐生 张 阳 译

马基雅维里

[英] 昆廷·斯金那 著

王能生 张 阳 译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张晓明

责任校对：张继红

封面设计：张 强

版式设计：魏 祥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马基雅维里

[英] 昆廷·斯金那 著

王锐生 张 阳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中国建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36×965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90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5004-1349-1/B·285 定价：4.00元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0

本书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英文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张晓明

副主编：章建刚

编 委：安延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张晓明

何明虹 章建刚

美 编：张 强 杨永德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

编者献辞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辑富于勇气的决定，《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从1985年到1992年，《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断断续续出版了36本。在编辑这套文库时，我们出于整体上的考虑收入了其中31种，并全力推出29本新书，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文库包含6个函套，每个函套中的10本书大致是依照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编定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或许会对某个思想时代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此次未被编入文库的5本思想传记，无论就传主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译文的质量而言，都丝毫不比目前这60本逊色，它们是：《柏克》、《亚

当·斯密》、《赫尔岑》、《托尔斯泰》和《福泽谕吉》。

值此文库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1985年7月，我们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曾设想“在三至五年内出书百本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过于浪漫了。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总是要脆弱一些，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套丛书的命运：起初，《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上被归入“黄书”一类；其后，理论图书市场的滑坡又几乎使这桩事业半途而废。因此，在推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暇为这个国内数十年来第一套大型思想传记丛书的最终出版而感到庆幸，我们更意识到：这套丛书的遭遇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并且它似乎还很难在世纪的转折之前有根本的改善。

经济的繁荣是世纪末的主题，这对于我们这个饱受一穷二白之苦的民族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同样现实的是，在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

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处于一种“无根的”流放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过：“思想即供奉。”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正是用以供奉思想的一个祭坛。与思想家同在，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在，这应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理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此时此刻，我们尚无从琢磨新世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祈盼着它的到来，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1993年3月13日

译 序

这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昆廷·斯金那所著的一本关于尼·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的传记。马基雅维里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欧洲军事著作家。在国内,除了某些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中偶尔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点简略介绍外,他的著作译为中文的,只有《佛罗伦萨史》一书。

在历史上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有一点显得与众不同:他既被恩格斯称赞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又长期被人误解,蒙受恶名。莎士比亚把他称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里”。在当代的评论者中,也有人称他为“罪恶的导师”。在国内的书籍中,评论者在依据经典作家的意见肯定其政治学说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必

定把他同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相联系，认为他的这个主义“为后世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直至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所利用，来为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

其实，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固然有缺陷，但把它指责为败坏道德、鼓吹邪恶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一种偏见。自从马基雅维里死后，有人阐发他的学说，许多政治人物从不同的动机出发，在实践中采用了他的治术。当然也有人反对他。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一词，就是反对他的人制造出来的。据史家考证，这个词出自法国人——他们饱经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王后卡德琳·德·美第奇暴政之苦，对意大利怀着强烈反感，从而制造了这个带有贬义的词，后来在世俗偏见的影响下，逐渐变成政治上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同义语^①。而马基雅维里本人的学说同这个“主义”，并非一回事。

平心而论，不能简单地把马基雅维里看作公开主张邪恶，反对任何人类公认的道德准则的人。他在著作中承认，新君主表现出那些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善的品质，是最值得称赞的。他甚至说过，当一个统治者生活得诚实而不欺骗，是

^① 这一说法采用威国淦的《佛罗伦萨史》中译本序言。

多么值得称赞。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过许多不应按这些道德办事的话。他甚至这样说：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有利。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人的本质是恶的。任何君主会发现，他处在一个大多数人不是善良的黑暗世界里，力图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因此，统治者如果按照道德主义者鼓吹的那些善良品质行事，就有失去自己的地位的危险。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认为，如果聪明的君主想维持他的政府的话，他的行动就有必要“与真理相反，与博爱相反，与人道相反，与宗教相反。”对于世俗的道德准则，当统治者“能做到时，就坚持正义的东西。”只是在必然性的命令下，他才背离这些美德。在许多场合，马基雅维里都把所谓“必然性的命令”理解为维护君主地位所需要的一切。从这些具体说法来看，他那些歌颂强者，宣扬暴力的主张，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为了实现统一的意大利这个最高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对于这个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者是给予肯定的，但对于“只要动机好，可以不择手段”的做法，马克思自始就反对^①）。不仅如

^① 参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页。

此,透过这些似乎骇人听闻的言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他的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核,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①。由此,就在政治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为什么说,这是“揭开了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任何在政治(包括权术)和道德领域之间的区分,都遭到反对。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一书中就宣扬道德支配政治的观点。这一观点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所接受,并通过他们撰写的给君主提供劝告的书籍而广为传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成了当时的人道主义者的流行谚语。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生活中,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苍的报应。然而,这同现实,特别是当时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暴君僭主争雄掠土,兵连祸结,甚至为了战胜对方而不惜勾结外国,引狼入室的现实,相去太远了。何况,当时的意大利虽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8页。

基雅维里作为现实的政治家,为了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和富强,自然不可能向这种麻痹人们思想的软弱的道德支配政治的观念求助。尽管他信仰共和主义,但现实生活却使他觉得,把实现统一的希望寄托于霸主——当时意大利各地的暴君僭主,更为现实些。因此他在谈论新君主应有的统治方式和手段时,把这些暴君僭主当作可供仿效的榜样,宣扬只要有利于实现目标,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

尽管马基雅维里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说法有缺点,但同以往的道德支配政治观点相比,他使政治理论摆脱道德的支配,实在是使政治和政治道德观点向前推进了。我们知道,唯心历史观的一个特点是“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终极原因”^①。使政治与道德分离,拒绝用道德来最终解释政治变革,就是向科学的历史观迈进一步。无怪马基雅维里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观察中,不时显露出令人惊叹的天才思想的闪光。例如,他十分重视物质利益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人们忘掉父亲的死比忘掉遗产的损失要快得多”——《君主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

他还认为，各社会集团之间在利益推动下的相互斗争并非纯粹是消极的，因为它们有助于阻止宗派利益取胜，是保持自由的“第一推动力”。他说，即使意见分歧本身是恶，然而它们是“为达到罗马的伟大所必须的恶”。

我们还要看到，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问题的学说基本上是从属于宗教神学的。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的授予（君权神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从神学中引出对国家、政治等活动的说明，谈不上有关于管理国家的本领（Statecraft）的真正研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和历史著作在这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马克思曾经指出，16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①。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坚持“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也摆脱了神学^②。

但是，马基雅维里在使政治理论观点摆脱道德的支配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极端：贬低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8页。

取消对人的行为的道德评价。他的主张是：只要有利于政治，管它道德不道德；聪明的君主“不会因残酷受人责备而烦恼”。

他否定道德评价的一个理由是：必然性的命令排斥它。他说，一个聪明的君主将首先听从必然的命令的引导：“为了保持他的地位”，他“必需非善良地去获取权力”。所谓“非善良的”，就是指“适合于动物”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适合于人的行为方式。就是说，为了遵从必然性，人可以象动物般行事，不必理会道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必然”的理解上，和马基雅维里有区别。但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说，我们也不赞成他把必然性与道德评价对立起来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①。妄想靠道德来解决复杂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固然是错误的，但道德作为被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东西，也可以反过来对历史和政治的进步起推动作用。

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佛罗伦萨史》是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巨著），在历史观上的巨大贡献，还表现在：他具有十分丰富的近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代历史哲学的思想萌芽。所谓历史哲学，主要的标志就是探求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历史的方向和进程，揭示认识历史的方法。正如马基雅维里在近代政治学领域最早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在历史领域，他也是最早用人的活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盛行的神学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拿他的贡献同晚于他将近 200 年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历史哲学的公认最初代表维科相比，丝毫不逊色。维科的历史观的出发点还是共同人性的发展，而马基雅维里则指出：“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①他认为，如果统治者“寻求使他们的个性适应于时代的事变，而不是企图按照他们的个性模型来重新塑造他们的时代，他们本来会更加成功”。他还说，“时代与世事在变化”，所以一个“不改变他的行为方式”的统治者迟早必定碰上坏运气。但是，如果“他能随着时代和世事而改变他的本性，命运就不会改变”。所以成功的君主总是这样的人：“他把他的行为方式适应于时代的性质”。这是多么辩证的思想！

^① 《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 卷，第 1 章，第 131 页。

如果社会的动乱、人事的成败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时代，那么时代本身的变迁即历史的发展就不能不是有规律性可寻的。马基雅维里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给予解决。他在《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序言中宣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就是要从人类种种活动的现象中探求他们的共同的动机，找出历史变迁的普遍规律来。关于这一点，文艺复兴史的权威布克哈特也看到了。他说：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把这个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成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①。诚然，马基雅维里没有找到真正的历史规律，陷于历史是“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的历史循环论中。但维科的历史观也同样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从马基雅维里的历史遗产中探讨、研究他的历史哲学的思想萌芽，无疑是有意义的。

以上，我们只是从政治思想史和历史哲学的角度，简略地讨论对马基雅维里的评价，但他是个多才多艺、在许多人文学科上都有巨大成

^①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0—81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